

陈寅恪研究

周言 编
余英时 汪荣祖 等著
反思与展望



余英时

汪荣祖

王晴佳

张求会

陈怀宇

刘广定

郭长城

胡文辉

谢泳

徐庆全

徐俊

高克勤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陈寅恪研究

周言 编

余英时 汪荣祖 等著

反思与展望

陳寅恪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寅恪研究：反思与展望 / 余英时等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3. 8
ISBN 978-7-5108-2270-4

I. ①陈… II. ①余… III. ①陈寅恪(1890~1969)
—人物研究 IV. ①K825.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6076号



陈寅恪研究：反思与展望

作 者	余英时 汪荣祖等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4.75
字 数	183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270-4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结集缘起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陈寅恪逐渐走出学界，成为坊间报章杂志热议的话题，这固然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的一纸风靡有关，而王元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曾经提倡“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此语虽然略显粗疏空乏，但多少道出了陈寅恪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场的时代背景。

坊间对陈寅恪的注意和议论其实早已有之，至少从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一些报刊记载来看，陈寅恪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坊间极大的关注。虽然陈寅恪当年入职清华颇多争议，近来更有学人指出其中多少有些祖辈的人脉关系在内，但是陈寅恪本人极高的学术水平乃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一九二五年陈寅恪应吴宓之招回国，就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同时期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也请陈寅恪前来开课，陈寅恪为当时的北大学子开了四门选题，其一为长庆唐蕃会盟碑藏文之研究，其二为鸠摩罗什之研究，其三为中国古代天文星历诸问题之研究，其四为搜集满洲文学史材料。^①从统计数据来看，该公告一共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十五次，当时陈寅恪之引人瞩目可见一斑。

而当时的清华也不落后，校刊屡有关于陈寅恪的消息。一九二七年王国维投湖自尽，梁启超也因为久居天津不常来校，随后于一九二九年病故，赵元任因为前往各地调查方言，亦不常在校，清华国学院中陈寅

^① 《北京大学日刊》，1926年，第1998期。

恪遂成一枝独秀。当时陈授课的情况，校刊都有介绍，一九二八年清华校刊登出本年度陈寅恪授课情况的简介：“《梵文文法》每周两小时，《唯识二十论校读》每周一小时。”^①三十年代《清华暑期周刊》还登过一则描写陈寅恪的小文章，其中有云：“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到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边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低，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行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了。”^②

当时一些学者与陈寅恪论学的来往书信也不时出现在报刊杂志上，陈寅恪写给徐炳昶的一封论学的信件发表在一九二七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期上，更可以窥见当时陈寅恪的学术声望；而后又有《与刘叔雅先生论国文试题书》，刊登在《青鹤》杂志一九三二年第一卷第三期上。而张荫麟也写下《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发表在《燕京学报》一九三四年第十五期上。更有学者以陈寅恪复信为荣，三十年代专研契丹文的学者厉鼎焄便曾经将《契丹国书略说》寄给陈寅恪雅正，陈寅恪复信表示嘉许，随后厉将陈寅恪复信收在论著之首，以为增重。时隔数年，又将其录出，刊行在《国学通讯》中。^③

而有关陈寅恪的奇闻轶事，也不时在坊间传播，《西北风》杂志曾经刊出一则《陈寅恪教授》的小文章，文中也谈及陈寅恪的穿着及其经常装书用的包裹：“陈先生全身上下，差不多找不出一件外国货。蓝布大褂（有时也穿灰色的），冬天在路上戴着一顶大皮帽，两旁的耳子遮着耳朵，可是常常有一只翘起，一只垂下。陈先生不用教授皮包，而用蓝

①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8年，第15期。

② 《清华暑期周刊》，1934年，第8期。

③ 《国学通讯》，1940年12月26日。

布和红布的大包袱，这些包袱跟随陈先生的年岁久了，上面都是斑斑驳驳，有几处颜色淡了些，有几处竟成了白色，里面包着的东西，都是木刻的书，不是《大藏经》，便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①该文深入人心，三年之后的一九三九年还曾经被转载，主标题为《近代名人轶事的一则》，可见当时社会对于陈寅恪的瞩目。^②

也正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期，陈寅恪受聘牛津大学，当时《学生杂志》、《教育通讯》等都有报道，《英文自修大学》杂志还专门刊登了陈寅恪中英文对照的生平简介，但是因为战争原因行程受阻。《史学季刊》以《陈寅恪教授赴英讲学未果》为题发表文章，对此无限惋惜，并且表示希望欧战早日结束，陈寅恪能够赴英传播汉学种子，并将欧洲汉学的新发展介绍到中国。^③而有名为谭凯光的作者更是接连撰文，认为中国最杰出的史学家不是胡适之，而是陈寅恪。^④《燕京新闻》对陈寅恪的一举一动都有观察，陈寅恪在联大所授科目，陈寅恪住院与否，该刊都曾经加以报道。^⑤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出版的两部隋唐史的著作，《燕京学报》在第一时间发表了两篇书评予以推介。^⑥

此时陈寅恪已经成为传奇，在哪里授课，到哪里教书，报刊皆表密切关注。比如，陈寅恪刚答应陈序经到岭南大学教书，《私立岭南大学学报》便称“名教授陈寅恪等将应聘到校授课”，^⑦可见岭南大学骄傲之情。而就在陈寅恪安居岭南之时，夏承焘写下《读“长恨歌”——兼评

① 《西北风》，1936年，第3期。

② 《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9年。

③ 《史学季刊》，1940年，第1卷，第1期。

④ 《民大导报》，1942年，第5期。

⑤ 《燕京新闻》，1944年，第10卷，第17期；1945年，第11卷，第16期。

⑥ 《燕京学报》，1946年，第30期。

⑦ 《私立岭南大学学报》，1949年，第91期。

陈寅恪教授之“笺证”一文，对陈寅恪提出商榷，夏承焘的这篇文章，也是一九四九年关于陈寅恪的最后一篇文章。

陈寅恪一九四九年之后的遭遇，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已经有详细的描述，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晚年的诗文。陈寅恪在晚年的学术生涯中，其诗作和其学术创作密切联系，共同体现了陈寅恪对于时代尖锐的批评，其在一九六四年的《〈柳如是别传〉稿竟说偈》中曾云：“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繁琐冗长，见笑君子。失明臆足，尚未聋哑。得成此书，乃天所假。卧榻沉思，然脂瞑写。痛哭古人，留赠来者。”充分体现了陈寅恪对于时代的深刻质疑。

对于陈寅恪晚年诗文的研究，发其肇始者，首推余英时先生，一九五八年在哈佛大学读书的余英时先生读到了陈寅恪托章士钊带到香港的油印本《论再生缘》，不由悲从中来，当时漂泊异国的余英时先生认为陈寅恪晚年写《论再生缘》，绝非无的放矢，究其深意，其一乃是借《论再生缘》陈端生之身世以寓自伤之情，其二乃是借《论再生缘》感慨世变。余英时先生的洞察，获得了陈寅恪“作者知我”的高度评价。^①

然而，余英时先生自己亦未料到，若干年后方知陈寅恪此文当时惹下大祸，不仅康生出面禁止《论再生缘》的讨论，周恩来也曾经让人给郭沫若打招呼：“不要再在报纸上讨论《再生缘》，以免由此伤害中朝友谊，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从这两则史料中可知余英时先生的敏锐。余英时先生后来在陈寅恪诗歌研究中再接再厉，接连写下数篇解读，惹来轩然大波。余英时先生认为陈寅恪晚年诗文充满了对于中国大陆政权的批判和质疑，其一九四九年原本想离开中国大陆，可

① 参见余英时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 2008 年版。

是天不遂人愿，于是陈在诗文中大肆发表其对当下境况的不满。^①余英时先生的观点引起著名作家刘斯奋化名冯衣北与他的论战。

继余英时先生之后，张求会、刘广定、郭长城等学者对陈寅恪一九四九年的抉择多有探讨，^②而胡文辉和谢泳算是陈寅恪研究中迥异于上述几位的研究者。胡文辉受余先生开辟的门径启发，收集了关于陈寅恪的种种史料，为陈诗做注，集成《陈寅恪诗笺释》一书，^③谢泳继而提出了一些与余英时和胡文辉解读陈诗的不同看法。^④

而也有许多学者通过档案材料挖掘陈寅恪与其周遭人物之间微妙的关系，近年值得注意的是王晴佳的文章。他通过对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年档案和朱家骅档案的考察，认为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关系微妙，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九年史语所撤至台北的这段时间内，陈寅恪没有配合傅斯年在史语所的工作。陈寅恪的这一做法，表现出他已经感觉到在史语所工作会与傅斯年的治所理念相冲突，不能再享受他所崇尚的“学术独立”。^⑤这为陈寅恪一九四九年的抉择增添了侧面观察的材料。而陈怀宇两篇关于陈寅恪的文章，即《1944年陈寅恪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始末》、《1947年陈寅恪获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始末》则利用域外材料，提供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际学界对陈寅恪推崇备至的佐证。

而陈寅恪的身后事，近年来也讨论颇多，尤其是关于陈寅恪遗稿的

① 参见余英时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② 参见张求会：《陈寅恪一九四九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南方周末》，2010年4月29日。刘广定：《陈寅恪先生1949年的选择》，郭长城：《陈寅恪有无来台意愿析论》，《传记文学》，2012年，第3期。

③ 参见胡文辉著：《陈寅恪诗笺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④ 参见谢泳：《陈寅恪诗笺释八则》，《东方早报》，2012年10月28日。另该报2012年度发表了谢泳多篇此类文章及商榷文章，此处不表。

⑤ 参见王晴佳：《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

问题，便引起过诸多争议。谢泳曾发表《陈寅恪诗抄之谜》一文，认为陈寅恪诗存在着许多抄本，其中有一种是从蒋天枢先生处散出来的，引起了蒋天枢的弟子陈正宏的不满，发文予以说明。陈寅恪诗文抄本的线索，仍待继续查找，相关的讨论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其实不仅仅是陈寅恪的诗稿，徐庆全在《追寻陈寅恪遗稿的故事》一文中曾经对陈寅恪的遗稿加以追踪，认为陈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将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乃是“托命之举”。一九四九年后，陈寅恪目睹和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但他信赖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①而关于陈寅恪著作出版诸事，高克勤作为看过相关档案材料的出版人，最有发言权，其发表的《〈陈寅恪文集〉出版略述》等相关文章，系统性地还原了陈寅恪著作出版的概况。^②

有关陈寅恪的话题，随着以后更多新史料的挖掘和新角度的观察，必将出现更多的论著，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未来陈寅恪研究的方向，乃是“将目光从官方移到民间”。

周 言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① 参见徐庆全：《追寻陈寅恪遗稿的故事》，《人民政协报》，2004年11月25日。

② 参见高克勤：《〈陈寅恪文集〉出版略述》，《文汇报》，2007年6月3日。

目 录

结集缘起

余英时

陈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 1

汪荣祖

《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序 | 20

王晴佳

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

——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 | 31

张求会

《夏鼐日记》里的“陈寅恪话题” | 48

陈怀宇

1944 年陈寅恪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始末 | 62

陈怀宇

1947 年陈寅恪获选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始末 | 75

张求会

陈寅恪 1949 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 | 85

刘广定

陈寅恪先生一九四九年的选择 | 94

郭长城

陈寅恪有无来台意愿析论 | 114

胡文辉

陈寅恪致牟润孙函中的隐语 | 128

谢 泳

陈寅恪诗抄本之谜 | 132

徐庆全

追寻陈寅恪遗稿的故事 | 148

高克勤

《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 | 165

徐 俊

一个未能实现的出版计划

——1960年代中华书局与陈寅恪先生的交往 | 174

徐庆全

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 | 195

高克勤

花开两枝

——中华上编、中华书局与陈寅恪著作出版概观 | 209

陈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余英时

今年（2010年）是陈寅恪（1890—1969）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大陆上出版了不少涵有纪念性质的专书。最重要的是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三姊妹合写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北京：三联书店）*、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和蔡鸿生《读史求识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同时广州《时代周报》也在8月9日出版了纪念专页。可知陈先生逝世虽已四十一年，他不但仍然活在女儿和弟子们的心中，而且继续受到新一代知识人的崇敬。

在这一特殊氛围的感染之下，我也忍不住要对陈先生再度表示一点诚挚的敬意。自从《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下简称《释证》）增订本出版以后（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我已退出了陈寅恪研究的领域。但是我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却没有中止，十几年来稍有关系的论著我大致都曾过目。现在借着《释证》重新排印的机会，我想就这些新论著中与《释证》相关的部分，略抒所见、所思、所感。

1997年10月我为《释证》增订本写了一篇《书成自述》，其中涉及大陆舆论对我有关陈寅恪论述的一些反应。当时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不久，所引档案资料相当丰富，然而在官方反应这一具体问题上，则尚欠完备。因此我的《书成自述》也只好概括言之，未能深入。现在新材料出现了，我觉得应该对这一问题重新回顾一番。

* 编者注：本书所收诸文，保留原注文方式。

《论再生缘》风波

新材料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我第一篇《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下简称《书后》）和《论再生缘》在香港正式出版，这两件事自始便分不开，因为如果《论再生缘》不能与读者共赏，那么我的《书后》便不免陷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状态了。关于印本《论再生缘》如何进入大陆以及官方的最初反应，我以前只看到下面两条记载：

第一，胡守为《陈寅恪传略》说：

1959年《论再生缘》的油印本流出香港后，被某出版商据以翻印，又在小册子之前写了一篇《关于出版的话》……香港《大公报》一位记者把这小册子带回广州，交给陈寅恪，陈对这篇《出版的话》非常不满，即把书送到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冯乃超处，并说明自己没有送书到香港出版，当时冯乃超指出，《出版的话》无非想挑拨他同党的关系，陈表示同意这一分析。（收在《文史哲学者治学谈》，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1页）

作者是陈先生在岭南大学教过的学生，1959年恰好“受党的委派”，以党员的身份担任了陈的“助手”。（见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第187页）所以《传略》所记的事实轮廓应该是可信的，至于陈先生是否对《出版的话》“十分不满”以及“同意”党委书记的“分析”，则是另一问题，可以置之不论。

第二，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1954年)2月,《论再生缘》初稿完成。自出资油印若干册。后郭院长沫若撰文辩难,又作《校补记》。(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

郭沫若参加《再生缘》的论辩,我最早得之于《编年事辑》初版(1981),后来才在陆键东《最后二十年》中获悉其全部经过(第89-93页),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无关联,则至今还不清楚。我曾有过一个推想,以为《论再生缘》传至北京,也许另有途径,未必是广州中山大学呈报上去的。1959年11月25日陈垣给澳门汪宗衍的信说:

久不通消息,正怀念间,忽奉到《论再生缘》一册,在远不遗,至为感谢。惟书前缺去三、四页,美中不足,倘能再赐我完整者一部,更感谢不尽。

同年12月5日汪复函云:

《论再生缘》二书乃寅老数年前之作,洗三家(按:洗玉清)屡为言之,乃其未成之稿,后流入港肆,被人盗印出售。偶得一册,而书中间有累句,出版说明更推波助澜,多违时之语,故特抽出三纸。顷承垂询,检出补寄,并另购一册邮呈,祈查收。(均见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11页)

从这两封信可知,1959年11、12月,陈垣已收到两册《论再生缘》,又汪宗衍同年4月1日来函,贺陈垣“批准入党”,(同上,第510页)援庵老人新入党,想必遵守党纪,既知《论再生缘》在香港被“盗印”,断

无不向党报告之理。因此我颇疑北京党中央知有此事，或直接或间接与陈垣有关。但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我也只能存疑而已。

徐庆全《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见《南方周末》，2008年8月28日D23版）是对此案发掘得最深入的文字，但因原文太长，不便征引。下面我想通过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来处理这一公案。这部五十万字的《年谱》是卞先生以九十九岁的老人，先后费去二十多年的工夫才完成的。全书对于相关史料的收集既广，审查也严格。关于《论再生缘》一案，《年谱》不但充分运用了上面提供的徐庆全的专文，而且还参考了不少其他记载。以下我将顺着《年谱》的时间次第，对此案始末先作一扼要的交代，然后再试加解说。

《年谱》1958年条末：

秋，余英时在哈佛大学偶然读到《论再生缘》的油印稿本，后在香港《人生》杂志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号发表《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一文，推断《论再生缘》“实是写‘兴亡遗恨’为主旨，个人感怀身世犹其次焉者矣！”（第309页）

又，1959年6月条：

余英时在美国哈佛大学发现的《论再生缘》油印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在海外轰传一时，议论纷纭。书前加了一篇序言，说像这样的书籍，在大陆上是不能出版的。（第311页）

卞先生将我的《书后》和《论再生缘》的出版写入《年谱》中，是因为这两个互相关联的事件很快便在谱主生命中激起波澜，先后延续了

三四年之久。

《年谱》1960年12月21日条：

杨荣国（英时按：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致函中华书局，云：“至于著作出版问题，中央同意，则贵局和陈进行商酌如何？”这里所说的“著作出版问题”，只能是已经惊动齐燕铭、郭沫若、康生等中央领导人的《论再生缘》了。中华书局拟出版《论再生缘》，这实际上是对余英时以此做文章的回应，否则，我们很难解释郭沫若会在一年之内排炮般地发表文章，因为如果是单纯的学术研究的话，以郭沫若职务众多、杂务缠身的情况看，恐怕是很难把精力集中于此的。与郭沫若有过交往的陈明远，在谈及此事时说，一九六一年郭沫若在研究《再生缘》之前，曾与康生交换过意见，隐约揭示出郭突然对《论再生缘》产生兴趣的深层背景。（陈明远：《我与郭沫若、田汉的忘年交》）如果陈明远所言不虚，则郭沫若的研究实是负有使命。（第314页）

上面一段叙事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而且读了之后仍然不免疑信参半。我的一篇《书后》和《论再生缘》在香港刊行何至于严重到必须“惊动……中央领导人”亲自披挂上阵？关于这一点，下面我将提出个人的观察，暂不多及。但上述的一切努力最后还是归于泡影，《论再生缘》既未能在大陆出版，郭沫若“排炮般”的文章也无疾而终。

最后《年谱》1962年1月条（第323页），卞先生总结此案，分别征引了三则史料：

香港出版《论再生缘》，一时轰动海外，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

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在内地出版先生著作与郭沫若校定的十七卷本《再生缘》，以响应海外议论。然而，由于这部乾隆年间的虚构作品语涉“征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康生出面中止对《再生缘》的讨论，先生著作与郭沫若校订本也被搁置起来。（徐庆全：《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南方周末》，2008年8月28日）

先生《论再生缘》出版一事，据当年中宣部干部黎之回忆：

有一次周扬正在教育楼主持部分文艺领导人会议。康生突然进来，站着说：“那个‘孟丽君’（《再生缘》中的主人公）可不能再宣传了，那里面讲打高丽，朝鲜方面有意见。”他讲完转身走了。（黎之：《回忆与思考——从一月三日会议到六月批示》，《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三期）

年初，周恩来总理曾经让人给郭沫若打招呼：“不要再在报纸上讨论《再生缘》，以免由此伤害中朝友谊，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郭沫若后来未再就此续写文章，从此在报纸上停止了这场讨论。（穆欣：《郭沫若考证〈再生缘〉》，《世纪》，2006年第五期）

综合以上三种来源不同的史料，我们可以完全断定，《论再生缘》事件确曾上达中共党内最高决策层，所以最后必须由“周恩来、康生出面中止”。接着我要讨论两个相关的问题：一、郭沫若为什么参加有关《再生缘》弹词的讨论？二、陈寅恪《论再生缘》为什么最后还是不能在大陆出版？限于篇幅，我对于这两个问题都只能点到为止，而不能展开论证。